

周法高先生在聲韻學上的成就與貢獻

竺家寧*

【提要】

周法高先生在語言學方面，涉獵較廣，提出許多具有啟發性的意見。本文專就聲韻學領域，對周先生的研究概況、重要論點、學說特色、對後人的影響諸方面，作一介紹和論述。分為下面幾個部分：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研究：這部分重要的論文包括〈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3 卷第 2 期，1970 年。《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臺北：三民書局經銷，1973 年。〈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 卷民國 61 年 12 月。〈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58 年 9 月。周法高先生的複聲母研究：周法高先生〈論上古音和切韻音〉一文，專節討論了複聲母，認為可以解決許多形聲字諧聲的問題。也作了音值上的擬定。對複聲母研究的開拓，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周法高先生的中古音研究：這部分重要的論文包括〈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說平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下），民國 41 年 7 月。〈讀切韻研究〉，《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2 期，民國 73 年 8 月。〈讀韻鏡研究〉，《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3 期，民國 73 年 9 月。〈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57 年 9 月。〈古音中的三等韻

*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民國 37 年 10 月。〈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5 本，民國 43 年 6 月。中古音一項重要的討論是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周法高說：「關於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陸志韋、李榮對高本漢的送氣說有所批評，這在辨義方面來說，是無關重要的。」（「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這一點，給學術界的啟發很大。周法高先生的重紐研究：周法高作《廣韻重紐的研究》指出，對於《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系聯的結果表明，在此書中同樣存在重紐的分別，並且是主要元音的分別。周氏另有《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1952）一文指出，除《廣韻》以外，《切韻》、《經典釋文》、《玄應音義》、《慧琳音義》等書中的唇音反切上字也有重紐的區別。這又是周先生的重要發現。周法高先生的佛經語言學研究：這部分重要的論文包括《玄應反切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33 年 8 月。〈梵文 $ḍṭ$ 的對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4 期，民國 37 年 6 月。〈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第 2 卷第 3 期，民國 37 年 7 月。〈玄應反切再論〉，《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5 期，民國 73 年 11 月。

關鍵詞：周法高 上古音 切韻音 複聲母

一、前言

周法高先生是一位傑出的聲韻學家，同時也是語法學家、詞彙學家，在所有語言學的領域當中，周先生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稱之為當代的語言學大師，應當之無愧。研究周先生的學術成就，論文著作很多，本文把焦點放在周先生的聲韻學方面，希望透過周先生在聲韻學方面的相關著作，談談他在聲韻學研究上的一些特點，以此做為紀念周先生百年冥誕的一份追思。

二、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研究

周法高先生早在 1969 年，在香港發表了〈論上古音〉一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 卷第 1 期，1969 年 9 月），對上古音問題做了十分重要的陳述。接著又陸續發表了幾篇重要的上古音著作，包括：1970 年的〈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3 卷第 2 期）、1972 年 12 月〈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 卷）、1973 年《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臺北：三民書局）。我們可以看得出來，1969 到 1973 這四年，是周先生全力探索和思考上古音問題的階段。

後人研究周法高先生的上古音，比較全面而完整的是張慧美教授指導的碩士論文《周法高之上古音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09 碩士論文，陳雅婷撰）。這篇論文強調了周先生是我國享譽國際的語言學家，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研究領域至廣，兼具音韻學、文字學、語法學、訓詁學、文學和史學各方面之長，其中尤以音韻學最能代表其一生研究的重點領域。周法高晚年更致力於上古音的研究，其上古音系建立在多年研究中古音的基礎上，博採諸家精華，提出真知灼見，他所建立的上古音系統，在上古音的研究歷史上，儼然已成為一家之言。（見其論文摘要）

這篇論文首先介紹了周法高先生上古單聲母和複聲母系統，再採主題方式分別提出單聲母和複聲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接著介紹周法高先生古韻部的分類、介音系統、主要元音系統和韻尾系統。又闡述了周法高先生對上古聲調

的看法，利用統計法證明上古實有四個聲調。本論文主要在架構出周法高的上古音系統理論，梳理出他與各家之異同所在，從中看出其承繼和創見，以及在音韻研究史上的貢獻和定位。

周法高先生在上古擬音方面，比較重要的有下面幾點。

(一) 上古韻尾 -b 的問題

他在〈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一文中，參考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說：上古有 -b 尾，主要的是因為諧聲中有唇音韻尾字跟非唇音韻尾字接觸的現象。例如「內」 $nu\tilde{a}i$ 諧「納」 $n\tilde{a}p$ ，古書且有把「內」當「納」用的，顯示「內」字本來讀 $nw\tilde{a}d$ 。但是在詩經裏，「內」字又只跟 -d，-t 尾的字諧韻，表示他那時讀 $nw\tilde{a}d$ 。關於這一點，最理想的解釋是：諧聲所代表的階段本來比詩韻早。諧聲時代的 $nw\tilde{a}d$ 是因異化作用 (dissimilation) 的關係到詩韻時代變了 $nw\tilde{a}d$ 。

-b 尾的擬定，使得上古陰聲字的韻尾系統，就有了完整的一套濁塞音，和 -d、-g 相搭配。同時，在周先生的解釋中，也妥善的交代了演化的問題，使得橫的方面（上古音系）、縱的方面（演化）都兼顧到。這類韻尾雖然不是周先生首創，但是，由於周先生的進一步確認，使後學者有所遵循，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

此外高本漢還假定：魚部的「去」在較早時也是 -b 尾。高氏在 *Grammata Serica* p. 28 說：「去」中古音 $k'iwo$ ，但是入聲葉韻的「怯」字 $k'jap$ ，以「去」為聲符，說明了「去」字原先也應該有一個雙唇塞音韻尾，因此定為 $k'i\tilde{a}b$ 。這個 $k'i\tilde{a}b$ 在很早的時期變成 $k'io$ （它和詩經中的 -o 類字押韻），「去」字的演變是發生分裂 (breaking) 的現象：去 $*k'i\tilde{a}b > k'io > k'iwo$ 。

周先生又認為：在較早的上古（可能包括殷代），「羽」和「去」都是收 b 尾的。周先生假定凡是在上古音中較早的時期具有主要元音 [a] 的 -b 尾字，在稍後會變成 -g 尾。例如：

羽 $**\Upsilon jwab \rightarrow *\Upsilon jwag \rightarrow \Upsilon jwo$

去 $**k'jab \rightarrow *k' jag \rightarrow kjo$

上古陰聲字的韻尾歷來是聲韻學上討論的重點之一，自從高本漢開始就把上古陰聲字的韻尾擬定為濁塞音，-b、-d、-g，後來董同龢、李方桂都進一步

證明了這樣的擬定，周法高先生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了更進一步的討論，提出了羽、去等字，上古有 -b 韻尾，並確定了它的演化方式，這是一項很有價值的論證，使上古音無論在橫的共時材料方面或者在縱的歷時演變方面，都有了比較完善的體系，語音演化把它的規則說清楚，這是擬音工作的重要原則。

(二) 確定舌、齒音聲母的分化條件

關於舌音端知系聲母、齒音精章莊聲母，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化最為複雜，周法高先生的擬測是：（王松木〈李方桂上古聲母系統述評〉，聲韻論叢，第十二輯，頁 41-68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4 月）

- *t+ø （一、四等韻）→t 端系
- *t+r （二等韻）→t̚ 知系二等
- *t+i （三等韻）→t̚ 知系三等
- *t+j （三等韻）→tɕ 章系
- *ts+{ø,j} （一、三、四等韻）→ts 精系
- *ts+r （二等韻）→tʂ 莊系二等
- *ts+i （三等韻）→tʂ 莊系三等

由這裡看出來，上古聲母比較簡單，但是介音比較複雜。上古的 *t 和 *ts 兩類聲母，到中古分化成爲端系 t，知系 t̚，精系 ts，章系 tɕ，莊系 tʂ，共五種不同的聲母。爲什麼會變複雜了呢？這就是不同的介音爲條件促成的分化。介音 r 和 i 促成了捲舌化，這就是知系和莊系。介音 j 促成了顎化，這就是章系，至於端系和精系沒有上述的條件，所以基本上不變。

上古二等韻有 r 介音，三等韻有 j 介音，這是一般聲韻學界都接受的。只有一部分三等字周先生擬訂爲 i，這樣和四等介音就不容易區分了。同時，這個三等的 i 如何促成中古音的捲舌化，也不好解釋。

周先生的三等介音，事實上分爲三類：j，i，ji，在音值上，周先生的說明是 i 相當於國際音標前元音較低的[ɪ]，ji 相當於國際音標前元音較高的[i̯]。於是，上古三等介音，就有三種不同的「細音」，變得極爲複雜。陳雅婷《周法高之上古音研究》統計了各家擬定的上古介音，周先生多達 13 種，遠超過其他各家擬音（見其論文 128 頁）。當然，這是爲了解釋重紐現象、唇音分化不得已的做法，我們想，也許這方面後人還可繼續思考，找出其他的解決辦法，

例如是否可以從元音差異上思考。

這個部分周法高先生談到了語音演化中分化條件的問題，這方面也給聲韻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因為語音演化是有高度規則性的，不是任何音可以變成任何音，必須說明什麼音在什麼條件之下變成另外一個音，或者在不同的條件之下產生分化，成為兩個不同的音，周法高先生對於端系字、知細字、章系字、莊系字，由上古的、中古的演化條件提出了細緻的分析，提供我們參考。

(三) 聲調區別意義的作用

周法高先生《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1962：43-44）重申他在1953年〈語音區別詞類說〉（原載《史語所集刊》24本，1953年，頁197-203）一文中的主張說：

根據記載上和現代語中所保留的用語音上的差異（特別是聲調）來區別詞類或相近意義的現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區別可能是自上古遺留下來的；不過好些讀音上的區別（尤其是漢以後書本上的讀音）卻是後來依據相似的規律而創造的。

周法高先生認為四聲別義是「上古遺留下來的」，這個問題，早在1946年，周祖謨就初步整理出一批以四聲別義的同族詞。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輔仁學誌》13卷1、2合期，1946；收入《問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81-119）把這些同族詞分為兩大類：一是因詞性不同而變調者；二是因意義不同而變調者。到了1962年，周法高先生進一步擴大這方面的研究。周法高把四聲別義的同族詞分為八大類，每一大類下又可細分為「某聲母與某聲母之別」和「清聲母和濁聲母之別」兩小類。丘彥遂〈從漢語詞族看上古聲母的擬音問題〉（《國文學報》第48期頁219-254，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臺北）認為周祖謨、周法高二位先生的成果是成功的，因為他們讓我們看到漢語〔四聲別義〕和輔音〔清濁交替〕的形態變化，使得古音的研究得以繼續往更嚴密、更有深度的層次發展。例如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6，1980；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306-339。）就繼承這一說法，並進一步探討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梅文附錄的字表就整理自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

周祖謨（1946：91）認為「以四聲別義遠自漢始，確乎信而有徵。清人所

稱此乃六朝經師之所爲，殆未深考。」周法高（1962：43）也有相同的意見，他指出：「某字的讀音最先見於記載的時期和它存在於語言中的時期並不見得一致。」、「那些討論一字兩讀起於葛洪徐邈、抑或起於後漢的人，只能證明其最早出現於記載的時期，而不能斷定其在語言中使用的時期。」

關於四聲別義的問題，也是漢語史上重要的討論課題，用聲調來區別意義，這是漢語的特性之一，周法高先生對於四聲別義現象產生的時代提出了精闢的論斷，認為文獻資料上看到的最早記錄不一定就是那個語言現象最早發生的年代，換句話說，四聲別義現象應該更早於漢代，也就是先秦上古音中應當就普遍存在，只不過東漢六朝的學者進一步根據這個原理，把一些字的聲調做了人爲的區分，六朝學者的理念是遇到一個字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意義、不同的詞性的時候，就人爲的賦予它不同的聲調唸法，例如「解衣衣（去聲）之」、「王（去聲）天下」等，這種人爲的四聲別義現象到了宋元時代產生了兩部集大成的著作，把歷來透過人爲制定的這種四聲別義歸納成書，這就是宋代賈昌朝的《群經音辨》以及元代的劉鑑的《經史動靜字音》。

（四）元音系統的簡化

音位系統的擬定，最合理的方式是又能解釋諸般現象，使無遺漏，又能符合經濟性原則，換句話說，就是用最少的符號解釋最多的內容。這方面，周先生的上古主元音系統做得最爲徹底。他只擬訂了三個主要元音。我們把二十世紀以來各家對主要元音系統擬音狀況，列表如下：

錢玄同	1934	9	ɔ、u、o、ə、ɐ、a、a、ɛ、æ
高本漢	1940	14	u、ǔ、e、ě、ə、ô、ô7、ε、o、ǒ、a、ǎ、â、a
董同龢	1944	20	e、ě、ə、ǎ、â、ô7、u、ú、o、ô、ǒ、a、ǎ、a、æ、A、ɐ、ɔ、ǒ、ǔ
陸志韋	1947	13	ě、ə、u、o、a、a、æ、A、ɐ、ɔ、ǒ、ǔ
王力	1957	5	e、a、o、ə、a
	1963	4	e、a、o、ə
	1985	6	ə、e、a、o、ɔ、u
雅洪托夫	1959	7	e、ə、u、ü、a、o、ä
方孝岳	1962	7	ɐ、a、o、ε、ɔ、u、ɐ
周法高	1970	3	e、ə、a
陳新雄	1972	4	ə、a、a、ɐ
蒲立本	1977	2	ə、a

嚴學窘	1980	7	e、ə、i、a、u、ɔ、o
李方桂	1980	4	ə、a、i、u
余迺勇	1985	5	u、o、i、a、e
李新魁	1986	14	ɪ、e、ø、ɛ、æ、a、ə、ɐ、A、u、o、ɔ、ɒ、ɑ
何九盈	1987	6	ə、ɣ、A、ɔ、a、æ
鄭張尙芳	1987	6	i、ɯ、u、o、
斯塔羅斯金	1989	6	i、u、a、e、o、ə
白一平	1992	6	i、i、u、o、a、e
潘悟云	2000	6	i、ɯ、u、o、a、e

(參考張雅蓉, 2008 蘇州大學博士論文,《說文解字的諧聲關係與上古音研》究)

由這個比較表我們可以看出歷來對上古音元音系統的擬定,最複雜的達到二十類元音,例如董同龢,其次也有十多類主要元音,例如高本漢、陸志韋、李新魁,其他學者都不到十類元音,而其中最少的有王力、陳新雄、李方桂的四元音系統,然而周法高先生擬定了三元音系統,除了蒲立本之外,數量是最少的,這是周法高先生在上古音上重要的特色,它使得音系變得簡單而容易掌握,符合了用最少符號描寫最多的語音區別和語音內涵,這樣的經濟性原則,除了數量方面,周法高先生擬定的三元音系統涵蓋了低元音〔a〕,這是所有語言不可缺的基礎元音,又涵蓋了中元音〔e〕,以及央元音〔ə〕,這都是人類語言中普遍存在的基礎元音,所以在音值的擬定上十分合宜。就元音系統來說,周先生的創見,的確是他上古音研究的一項重要特色。

三、周法高先生的複聲母研究

上古漢語帶有複聲母,在十九世紀末就發現了,但是具體的研究要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才開始。當時也有懷疑論者產生,正如哥白尼發現《天體運行論》、達爾文發現生物進化一樣,當時總會有人懷疑。可是經過了長時間的驗證,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上古有複聲母終於成爲定論。

周法高先生〈論上古音和切韻音〉一文,專節討論了複聲母,由此解決許多形聲字諧聲的問題。並作了音值上的擬定。周先生對複聲母研究的開拓,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看看周先生的觀點：

(一) KL 型複聲母的擬音問題

首先，高本漢在《漢語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中，提出擬構帶 l-複聲母的三種方式：

1. 各 klâk : 洛 lâk
2. 各 kâk : 洛 klâk (glâk)
3. 各 klâk : 洛 glâk

高本漢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修訂漢文典》(GSR)中，均以 C 式為主。董同龢曾經批評高本漢將 C 式用得太多，並指出純用 C 式所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一，有一部份-l-母字是同時並諧兩個或兩個以上聲母系統的，如麥 lieu : 謬 miəu - 廖 t' (<*t') jəu - 膠 kau ; 第二，如果碰到 l-母字跟喻母字相諧的例，C 式也是不能用的，如：樂 lâk : 藥 i (<*g) ak、立 l jək : 翌 j (<*g) k ; 第三，把 C 式用得太多，會抹殺許多可能性更大的事實，如：高氏擬作各 kl- : 路 gl- : 露 gl-，亦可逕擬為各 kl- : 路 gl- : 露 l-。因此，董同龢認為不能單取某種方式來擬構上古複聲母。周法高也對高本漢的擬構有所批評，指出：高氏把與舌根音相諧的來母字擬為 *gl-，然而，在高氏擬構的音系中，已把喻三擬為 *g-，且把喻四和舌根音相諧的字也擬為 *g-，因此，若把同時和舌根音、來母相諧的喻母字擬為 *gl-，便與來母 *gl- 相衝突，於是，高氏便不得不把喻母的一部分改擬為 *g-，以免和來母 *gl- 衝突，如：“位” *g i wəd > jwi > wei ; “立” *gliəp > liəp > li ; “泣” *k' liəp > k' iəp > k' i。因此，周法高決定採取 A 式，把來母擬為 *l-。

(二) 擬定完整的複聲母體系

複聲母研究的過程，有如清儒古韻分部的過程一樣，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像接力賽一樣，一棒接一棒。二十世紀前半，學者們所做的研究都是一項一項複聲母的求證工作，他們在論文中討論有這種複聲母，別人又在另一篇論文發現另一種複聲母。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逐漸發展成為系統性的研究，也就是企圖找出總共有多少類複聲母？彼此之間怎樣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企圖把所有漢字納入這個系統當中。由局部走向系統，這是學術發展必然的趨勢。周先生在這一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09 碩士論文，陳雅婷《周法高之上古音研究》的統計，周先生的複聲母系統，有以下幾

種類型：

第一類	流音和其他聲母結合的複輔音	帶 l- 之複聲母	唇音	*pl-、*p' l-、*bl-、*ml-
			舌頭音	*tl-、*t' l-、*dl-
			齒音	*ts' l-、*sl-、*st' l-
			牙喉音	*kl-、*k' l-、*gl-、*ŋl-
		帶 l- 之複聲母	唇音	*pr-、*p' r-、*br-、*mr-
			舌頭音	*tr-、*t' r-、*dr-、*nr-
			齒音	*tsr-、*ts' r-、*dZR-、*sr-
			牙喉音	*kr-、*k' r-、*gr-、*ŋr-、*xr-、*vr-、*r-
第二類	舌尖清擦音 s- 和其他聲母結合的複輔音	*st' n-、*sd- (寫作*zd-)、*sk' -、*st' -、*sŋ-、*sn-		
第三類	邪紐、喻以紐和舌根音結合的複輔音	*vr (j) -、*vr (i) -		
第四類	喉牙音和舌齒音及唇音結合的複輔音	*t-、*t' -、*d-、*st' -		
第五類	鼻音和非鼻音結合的複輔音	*tn-、*t' n-、*xm-、*ŋg-		

這五類中，第一類〔帶 l 的複聲母〕、第二類〔帶 s 的複聲母〕研究的論文最多，起步研究的時間最早，獲得的成果最豐碩。大致上今天都已成爲定論。其他三類屬於正在研究中的部分，學者們分別從古代文獻、漢字結構、漢藏語言等方向繼續探索中。後三類的複聲母結構，也可以在同族語言中看到。我們不能排除在上古漢語中存在的可能。

其中第五類，也有人成之爲〔帶鼻冠音〕的複聲母，不過多半學者的鼻音成分會放在前頭。例如 mb-、nd-、ŋg- 等。

(三) 書母的上古念法

關於章系字聲母上古擬音的問題，李方桂從《經典釋文》、《原本玉篇》、守溫《韻學殘卷》、和近代方言等資料，發現船禪不易區分，進而認爲中古船禪兩母在上古同出一源。竺家寧和李新魁皆同意此說。周法高先生〈論上古音和切韻音〉（1970：138），對於這兩紐的看法是：

在一些方言中，從紐 dz 和邪紐 z 不分，禪紐 dʒ 和牀船紐 ʒ 不分（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謂「南人」的音，梁顧野王《玉篇》的反切都是如此；晚唐守溫的《韻學殘卷》牀船紐和禪紐不分），不過在《切韻》和初唐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反切中保留很明顯的分別，二者絕非因襲，也非偶和，而是根據實際語音的。

周法高先生認為牀船紐和禪紐應分立，其音值的擬訂採取陸志章的說法，把中古的牀船紐擬為 z，禪紐擬為 ʒ，而上古的牀船紐則擬作 *zdj-，禪紐擬作 *dj-。

屬於同一套聲母的〔書母〕又如何呢？關於審書紐的音值，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1980：14、25）中提到〔審母三等〕大多來自上古舌尖塞音，但是仍有牽涉到複聲母的部分。他認為〔審書紐〕可擬為帶有 s-詞頭的音值，因常和舌尖塞音互諧，在近代方言中也有塞擦音的又讀，所以應擬作 *sth+j。周法高先生在〈論上古音〉（1969：54），中認為〔審書紐〕和〔心紐〕皆出現在三等韻，為了避免衝突，決定採取李方桂的說法，擬作複聲母形式的 *st'j-。在〈論上古音和切韻音〉（1970：137）中說明〔審書紐〕*st'-會在介音 -j- 或 -ji- 之前顎化成《切韻》的書母 ś。

審書紐在諧聲系統中常和舌尖塞音、舌根音以及泥娘日紐互諧，所以為了解釋其複雜的諧聲情形，多數學者認為〔審書紐〕在上古應是複聲母的型態。高本漢、董同龢、王力皆擬作舌面前清擦音 *ç-。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80：14）加以批評，認為〔審書紐〕常和舌尖塞音互諧，若是擬作 *ç-，則無法解釋和塞音互諧的事實。李方桂早期把〔審書紐〕擬訂三個來源：*sth+j（和舌尖塞音互諧）、skh+j（和舌根音互諧）、*hn+j（與鼻音互諧）。後來在〈幾個上古聲母問題〉（1976）一文中著眼於語音結構的系統性，把前兩者的〔審書紐〕改擬作 *hrj-，後一個保留不變。周法高先生在〈論上古音〉（1969）採用李方桂原本的說法，認為審書紐應擬為帶 s-詞頭的 *st'-；到了〈論上古音與切韻音〉（1970）他更將與泥娘日紐發生協聲關係的審書紐擬作 st'n-。此外，周法高先生在〈論上古音和切韻音〉（1970：131）中對於周祖謨〈審母古讀考〉（1941）一文中的看法加以批評，他說：

我在〈論上古音〉一文中，從李方桂師之說，擬為 *st-，對於周祖謨所舉出來的兩種現象，都可以解釋了。周氏把審母三等字分為兩類，又說有例外（如

「伸」和「信」相通），都是不必要的。

由上可知，周法高認為〔審書紐〕擬作*st-，恰可針對周祖謨提出〔審書紐〕可分別與舌部塞音和摩擦音諧聲的現象作解釋。

至於筆者《古漢語複聲母研究》（1981：412-413）認為〔審書紐〕是從*sd-變來，後來d失落再清化成中古的ç-。不採用*st'-的擬法，是因為和塞音接觸的ts、ts'、dz'上古音擬訂為st、st'、sd'，沒有照李方桂的辦法，把心母定為st，審母定為st'，就是為了避免跟這類ts、ts'、dz'的上古音相衝突。這個*sd-和李方桂和周法高兩位先生的*st'-在思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就是無論如何擬訂，書母的來源必然是複聲母，而且第一成分一定是s-第二成分一定是個舌尖塞音。

四、周法高先生的中古音研究

中古音方面，周法高先生在1948年同一年中發表了好幾篇中要的著作，這部分重要的論文包括

1. 〈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2. 〈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3. 〈說平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4. 〈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48年10月。

1948之後，陸續發表的論文，較主要的有下面幾篇：

1. 〈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年7月。
2. 〈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5本，1954年6月。
3. 〈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卷第1期，1968

年9月。

4. 〈讀切韻研究〉，《大陸雜誌》，第69卷第2期，1984年8月。

5. 〈讀韻鏡研究〉，《大陸雜誌》，第69卷第3期，1984年9月。

在這些論著之中，周先生提出的重要論述，有下面幾個方面：

(一) 中古音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

中古音一項重要的討論，是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早期學者曾經為這個問題做了熱烈的討論，周法高先生的看法是：「關於全濁音聲母是否送氣的問題，陸志韋、李榮對高本漢的送氣說有所批評，這在辨義方面來說，是無關重要的。」（「論上古音和切韻音」）周先生的意思是，全濁聲母在上古也許可以分送不送氣，到了中古階段，送不送氣已經失去音位上的對立性。所以，我們標示作送氣也好，不送氣也好，都無關緊要，送不送氣已經是一個音位之下的同位音。這一點，給學術界的啟發很大。周先生在這個課題上，表達了個人的判斷，使後學者不致在不同的說法中，產生何去何從的困惑。

我們觀察語音學上，全濁輔音的演化過程，總是從送不送氣對立，向失去對立性演化，這是語言的共性。印歐語言的濁音正是這樣的過程。例如著名的格林語音律：

Grimm's law affected the PIE (Proto-Indo-European) stop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heme:

<u>PIE</u>	<u>Germanic</u>
p, t, k	f, θ, x
b, d, g	p, t, k
bh, dh, gh	b, d,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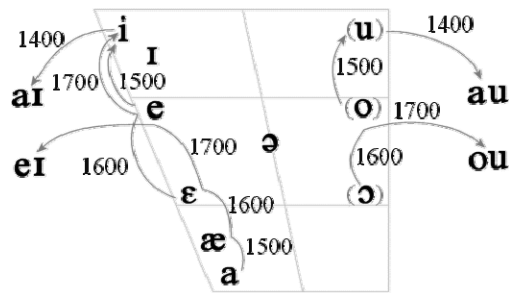
左邊的上古印歐語，需要講究送不送氣，演化到右邊的日耳曼語，濁音就不再區分送不送氣了。這就是語言的共性，印歐語是這樣，漢藏語也是這樣。所以周先生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濁音的演化，無論印歐語言或者漢藏語言，都呈現了相同的規律性，也就是由早期的送氣弱化為後來的不送氣，然後再發生濁音清化，或者濁音失落。所以在早期的狀態，塞音往往具備四重對立：〔bh、dh、gh〕、〔b、d、g〕、〔ph、th、kh〕、〔p、t、k〕，既有送氣不送氣的區別，又有清濁的對

立，漢語的上古音正是如此，例如，邪母字爲〔d-〕（>z-）、定母字爲〔dh〕（>d-）、匣母字爲〔g-〕（>v-）、群母字爲〔gh-〕（>g-）、嵐字爲〔bl-〕（>l-）、龐字爲〔bhr-〕（>b-）。正是具備了濁音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跟清塞音形成了四重對立。到了中古跟印歐語言的演化一樣，濁塞音失去了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到了中古只有一套濁塞音，這一套濁塞音一般在寫法上都標爲不送氣，但在音位上這個濁音的送氣不送氣都是同位音。

（二）中古音魚虞的差別和來源

在漢語歷史中，「魚虞模」這幾個韻是變化最大的。從上古到中古，由低音逐漸高化，由最低的元音〔a〕向最高的元音〔u〕演化，形成了漢語的「元音大轉移」現象。這種現象也是語言的共性之一。在印歐語言中，上古英語到現代英語，正是經歷了同樣的「元音大轉移」（Great Vowel Shift）。



例如 *meat* 主元音由〔ɛ〕變爲〔i〕，*food* 主元音由〔o〕變爲〔u〕，*take* 主元音由〔a:]〕變爲〔ei〕，都是元音高化造成的。

周法高先生 1948 年曾撰〈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一文，承續了 1924 年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期），當時引起了古音學上的大辯論，對於「歌戈」的古讀雖然確定了，而「魚虞模」的音讀，還沒有可靠的結論。周法高先生在論述中提出，切韻中的魚韻是開口，主要元音雖然跟虞模韻的元音相近，卻有點兩樣：第一，在佛典譯音裏，不用魚韻字對譯梵文的 o、u，而用虞模韻字。第二，在南北朝後期的韻文裏，虞模成一類，魚獨成一類。第三，有幾個方言魚虞不混，魚韻有一個不圓唇的元音。我們把魚韻寫作 $\tilde{I}o$ （這個 o 是開 o）。和模韻相配的，是虞韻而不是魚韻，虞韻的韻母是 $\tilde{I}wo$ 。（這個 o 是關 o）。周先生認爲這樣的假定，可以向上適用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三) 對於三等韻唇音的研究

周法高先生 1952 年發表了〈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一文，對於一般學者不太注意的三等韻唇音，進行了細緻的分析，認為切韻中的唇音，根據系聯的結果，大概分為甲乙二組。甲組替純一、二、四等韻作切語上字。乙組隸三等韻，包括輕唇音和一些重唇音：這些重唇音在韻圖上分列在三四等。為稱說方便計，周先生管四等的重唇音叫 A 類，三等的重唇音叫 B 類，純三等的輕唇音叫 C 類。A、B 兩類有時用 C 類作切語上字，所以 A、B、C 三類便系聯在一起了。

周先生指出，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裏，我們看到間或也有用甲組或 C 類字作反切上字的，可是兩 A、B 類的反切上字卻很少相混。

周先生又指出，玄應《一切經音義》A、B 義兩類的反切上字也不相混淆，不過因為都用輕唇音作切語上字，所以在系聯上便分不清了。至於慧琳《一切經音義》裏的反切，A、B 兩類的劃分也很顯然。我們可以看出四等韻的反切上字和 A 類關係較密切而和 B 類疏遠。如果把《廣韻》、《切韻》、《經典釋文》、《玄應音義》、《慧琳音義》裏 A、B 兩類唇音的切語上字列舉出來，就可以看出 A、B 兩類的切語上字大致不相混淆。

對於這樣的分部現象，反映了怎樣的語音呢？周先生認為不妨採用平唇 p-和撮口 P^w -的區別來解釋 A、B 兩類唇音切語上字不混淆的情形。不過周先生又認為在寫法上因為已經由元音表示出來了，把 w 省略了也無關係。

周法高先生採用平唇 p-和撮口 P^w -的區別，其中右上角的 w 表示圓唇化的發音，這類發音在高本漢的唇音擬構當中曾經提及過，

(四) 《切韻》的性質的討論

《切韻》反映的音系到底如何？歷來也是聲韻學上一個主要的爭論焦點。陳寅恪先生〈從史實論切韻〉一文，對《切韻》的性質，多所論列。陳寅恪舉出，陸法言之寫定《切韻》，其主要取材之韻書，乃關東江左名流之著作。其決定原則之群賢，乃關東江左儒學文藝之人士。高齊鄴都之文物人才，實承自太和遷都以後之洛陽，而東晉南朝金陵之衣冠禮樂，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之洛陽，是《切韻》之語音系統，乃特與洛陽及其附近之地域有關，自易推見矣。又南方士族所操之音聲，最為接近洛陽之舊音；而《切韻》一書所遵用之原則，

又多所取決於南方士族之顏蕭。然則自史實言之，《切韻》所懸之標準音，乃東晉南渡以前，洛陽京畿舊音之系統，而非楊隋開皇仁壽之世，長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這是陳寅恪的意見。周法高先生關於《切韻》音的性質，在 1944 年〈玄應反切考〉說：《切韻》究竟是代表一時一地之音，或是雜揉古今方國之音，說者紛紜。從整個漢語音韻系統籠統地看《切韻》音，我們把它當做上古音和近代語音變遷的橋梁。陸法言和玄應所根據的，究竟是什麼方言呢？他們時代相近，都是久居長安，最大的可能當然是七世紀的上半首都所在地的長安方音。我們可以說：《切韻》音和玄應音相同的百分之九十的成分，是能代表長安方音的。接著，周先生歸結說，我們不妨說，《切韻》音代表隋唐首都長安士大夫階級所公認的標準音；此標準淵源於「洛陽舊音」之系統。周先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證據，《釋文》音和《切韻》、玄應、慧琳《音義》裏三等韻重唇音 A、B 兩類的反切，都大致不相混淆。假使他們不是基於實際語音的話，這種細微的分別是無法用人為的方法保留的。周先生又補充說，過去多認為《釋文》和《原本玉篇》的反切屬於南音系統，現在似乎有重加檢討的必要了。

周先生對於《切韻》性質的論斷，雖然不是學術界最終的定論，卻是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的論斷。足以作為我們了解《切韻》性質的參考。

（五）中古音「平仄」的發音特性

「平仄律」是中古文學的重要基礎，那麼，它的意義在哪裡？它是兩種怎樣的發音呢？為什麼把平仄交錯起來，會產生韻律美感呢？這些真相，從文學中是無法找出答案的，必須從聲韻學當中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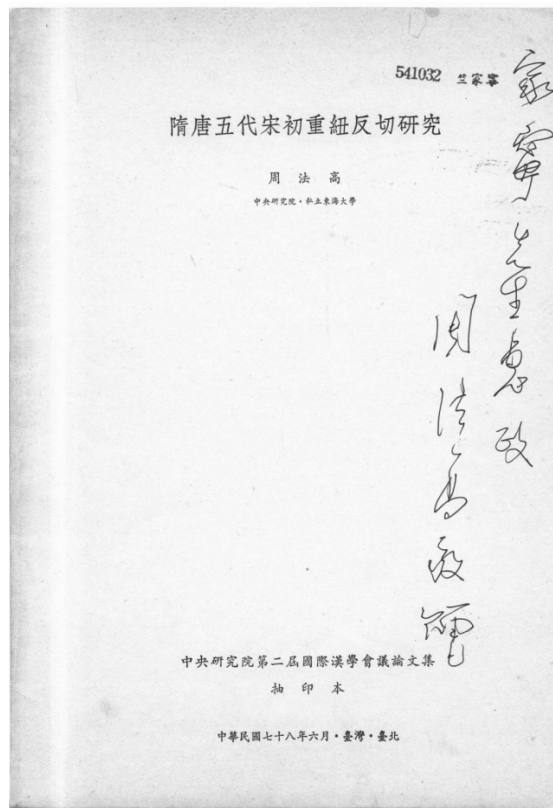
周法高先生 1948 年發表《說平仄》一文，提出了一個思考：在開始把四聲歸成兩類的時候，為什麼不兩兩相對，如平上對去入，平去對上入，平入對上去等，而偏拿平聲和上去入三聲相對呢？周先生說，我們可以假定：平仄的配合，是由於高調和低調，或是平調和升調降調的配合。另外，我們可以想像平仄的分別，是由於長短的不同。周先生舉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十六章說：中國古音，有以下的四聲：平聲（橫調，舒收）、上聲（升調，舒收）、去聲（想來大概是降調，舒收）、入聲（促收）。接著，周先生論證說，我們可以看出玄應用上聲「塢，理」，入聲「壹」，代表梵文短音；用平聲「阿，

伊，烏，釐」代表他所謂的長音。義淨用上聲「枳，矩」，去聲「計，告」，入聲「腳」，代表他所謂的短音，用平聲「迦，雞，俱，孤」代表他所謂的長音。兩家代表短音的，都是仄聲字，代表長音的，都是平聲字。所以，周先生歸結說，我們可以相信唐初的四聲有長短的區別。在唐初甚或在較早的時候，四聲中平仄有長短的區別。這區別構成了當時韻文中平仄對立的主要因素。至於四聲分別的主要因素，也許還是高低，不過長短的區別，也不失為一個因素。

周法高先生利用梵文的對音，證明中古當時平仄的區別，這是很有說服力的。使我們對平仄律的語音基礎，能夠確切的掌握。因而對唐詩以及其他的中古韻文就能夠更容易理解其中韻律的奧妙了。

平仄問題是一個文學問題，也是一個語言問題，中古時代的詩歌講究平仄律，一般只知道仄聲就是上去入三個聲調，為什麼會產生平仄二分的現象呢？顯然在中古音的發音上，平聲是一類，上去入聲是另一類，彼此之間有顯著的對立性，文學家就利用這種音響上的對立性塑造了平仄律，成為唐詩的基本典範，那麼這兩類發音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狀態，為什麼利用平仄的搭配就可以產生優美的韻律效果呢？關於這個問題，唐朝的處忠大師曾經說過「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這是描述四聲發音的最早資料，王力在《漢語詩律學》書中認為平聲是一種拖長的發音，音高不會上升也不會下降，而仄聲都是短的發音，會有音高的變化，或者上升或者下降，這就是平仄的真相了，這一點跟周法高先生的看法不謀而合，在詩歌的韻律上，適應各種語言的特色，而有不同的韻律規則，英文詩講究輕重律、長短律，而中文詩歌講究的是平仄律，這都是適應不同的語言而衍生的韻律規則。

五、周法高先生的重紐研究



重紐現象是聲韻學中的一個大問題，研究的論文不下百篇，周法高先生在這方面是先驅者，早在 1945 年就發表了〈廣韻重紐的研究〉一文（《中國語言學論文集》，1-71 頁，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周先生指出，對於《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系聯的結果表明，在此書中同樣存在重紐的分別，並且顯示的是主要元音的分別。周先生又指出，《廣韻》重紐呈現三種現象：

1. 第一種重紐，分屬於切語下字不相系聯的兩類，並且不是後來增加的，如支韻開口羣紐：「祇」巨支切「奇」渠羈切，牠們的切語下字，同時也不相系連，分屬兩類；這兩個反切下的字都很常見，從切韻就有，並不是後來增加的。周先生認為這一種重紐，在語音上，一定有差別的。
2. 第二種重紐也不是後來增加的，但是牠們的切語下字，可以系聯成一類；不過在平上去入相承的其他韻中，卻往往有重紐發現，有時並且分屬兩類。如

脂韻合口羣紐：「葵」渠追切，「逵」渠追切（「逵」字「切二」作渠淮切，「王二」作渠佳切），切語下字互相系聯，不分二類；但是在脂韻的上聲旨韻、去聲至韻，都有重紐，並且至韻合口的重紐分屬兩類。

3. 第三種重紐是：重紐之一往往列於韻末，收字很少，不見於《切韻》，並且字也不常見，大多數可以斷定是後來增加的。如隊韻匣紐：「潰」胡對切，十一，「蚘」胡輩切，一。「蚘」字靠近韻末，《切韻》都沒有收，就認為是後來增加的。

那麼，應該如何構擬音值呢？周先生認為 A 類（重紐四等）和 B 類（重紐三等）字的音值必定極相似，所以韻書的作者把它們放在一韻，並且有時切語下字常常混淆。有些方言當 A、B 類的某些字有不同的音讀時，B 類的字往往和同攝 B2 型的韻類一樣讀法。所謂 B2 型，指經常出現在牙喉音 k 組（除去喻以紐），唇音 P 組聲母下。B2 型的韻類如下：微、廢、文、欣、元、庚二、嚴、凡。

1989 年周法高先生發表了〈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提出六種古籍資料來證明重紐 A、B 類的分別是在聲母。這個新論點改變了他 1945 的看法。他說從關於重紐反切的資料諸書中，重紐 A、B 類都是有分別的。宋代《韻鏡》、《七音略》中，對於重紐喉牙唇音分列三四等，是有其語音上的根據。重紐 A、B 類的分別是在聲母。周法高先生採用日本三根谷徹的說法，假定重紐 A 類的喉牙音聲母是顎化的，而 B 類則否。

周法高先生提出的證據，首先是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重紐 A、B 類喉牙音字。其中 A、B 類喉牙音字不互用作反切上字的現象，和重唇音 A、B 類字的情形相同。見紐 A 類（16 條）、見紐 B 類（23 條）、溪紐 A 類（69 條）、溪紐 B 類（1 條）、群紐 A 類（8 條）、群紐 B 類（1 條）、疑紐 B 類（2 條）、曉紐 B 類（1 條）、影紐 A 類（120 條）、影紐 B 類（14 條）。B 類字用 A 類字作反切上字的只有一條（群紐 B 類的「鍼」字用 A 類的「祇」字作反切上字。），其餘都沒有例外。

其次是顏師古《漢書音義》中的重紐 A、B 類。周法高先生發現重紐諸韻之喉牙唇音字，三等喉牙唇音字必以三等喉牙唇音字為反切上字；四等喉牙唇

音字必以四等喉牙唇音字爲反切上字，二者分用不混。清韻系之喉牙唇音字，所使用之反切上字皆爲具有重紐諸韻之四等喉牙唇音字。

再其次是《玄應音義》中的重紐 A、B 類。其中 B 類字用 B 類字作切上字者，計見紐十六見，溪紐二見，群紐二十六見，疑紐十見，曉紐十一見，共六十五見，無例外。

再其次是《慧琳音義》中的重紐 A、B 類。其中三等韻 A 類和四等韻可互相用作切語上字，至於 A 類和 B 類則不互相用作反切上字，這種現象只有聲母的區別才能解釋。

再其次是朱翱所作《說文繫傳》反切中的重紐三、四等重唇音字。其中重紐 A、B 類唇音不互相用作反切上字。如：匹類（即滂紐）：匹（篇七）。步類（即並紐）：被（平義）。

再其次是《集韻》中的重紐 A、B 類。其中重紐 A、B 類的區別也反映爲聲母的區別，是宋初的語音中重紐的區別仍然存在。

劉心怡〈周法高之中古韻母系統研究〉（《有鳳初鳴年刊》第二期 2005 年 7 月，頁 109-124，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生會，臺北）探討周法高之中古韻母系統。三等韻部分，包括三等韻的分類、重紐 A、B 類的音值構擬（周法高早期主張重紐 A、B 類的區別在主要元音，晚期則主張區別在聲母），以及三等韻 C1、C2 類的音值構擬。對周先生的重紐詮釋也做了完整的介紹。

周先生另有《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1952）一文指出，除《廣韻》以外，《切韻》、《經典釋文》、《玄應音義》、《慧琳音義》等書中的唇音反切上字也有重紐的區別。這又是周先生的另一項重要發現。

重紐現象歷來討論得最多，意見也比較分歧，周法高先生早年的看法和晚年的看法就有不同，1997 年聲韻學會曾經專門爲重紐現象舉行過一次專題研討會，發表的文章結集於《聲韻論叢》出版，這一輯重紐問題專號是重紐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這個研討會中，學者們逐漸凝聚了一個共識，就是重紐三等跟重紐四等的區別，是〔-rj-〕和〔-j-〕的不同，龔煌城由漢藏語的比較加以證明了這種區別，施向東又從梵漢對音中證明了這個擬構，丁邦新也認爲重紐三等字都帶有〔-rj-〕的介音，同時發現梵漢對音裡頭總是用重紐三等字來對譯漢文的〔-r-〕，而重紐四等字則對譯漢文的〔-i-〕，又鄭章尙芳和陳貴麟的

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這個共識使我們知道上古帶〔-r-〕的複聲母到了中古時代並沒有完全消失，這些複聲母殘留在某些方言當中，於是編寫韻圖的人就用重紐的特殊排列方式，把它們安排在等韻圖中，正因為它是一種殘留的方言現象，所以設計等韻圖的和尚，沒有把這種區別納入正式的架構當中，因此等韻圖的主架構仍然是四個等的區別，〔-r-〕在三等韻裡再做了一個權宜的區別，把一部分三等字借放到了四等位置上，這種權宜的作法正說明了它是局部的現象，不是當時雅言共同語的區別，對於重紐得這個新發現，竺家寧 1997 年撰寫了〈重紐爲古音殘留說〉，發表在《聲韻論叢》第六輯當中，這是重紐問題的新發展，可以視爲對周法高先生重紐研究的延續與補充。

六、周法高先生的佛經語言學研究

我們一般提到佛經語言的問題，大家都覺得佛經很難讀。佛經爲什麼難讀？一般的回答是因爲佛學深奧、佛理深奧。其實，更主要的癥結，不在佛理深奧，而在於語言的障礙。因爲，佛經不是白話的，也不是文言文，精通文言文，精通白話，也未必看得懂佛經。佛經語言是什麼呢？是一千年前的口語。這是佛經很重要的一個特性，口語化很高。佛教爲了要傳教的目的，它在翻譯的時候，是使用當時漢語當中最容易了解的詞語、最社會化的詞語，每個人都可以看得懂，都可以了解。但是，時隔千年，當時的口語，到今天，產生了巨大的變遷。有很多我們現在已經不用的、或者意義改變了，所以我們看佛經，感到很困難、很陌生、有距離感。但是佛經因爲保留了一千年前的口語，因此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古漢語，它就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我們可以透過佛經，了解中古漢語的詞彙現象、語法現象甚至文字的問題。所以近年來，佛經語言成爲一門顯學，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周法高先生這部分重要的論文包括：

1. 〈玄應反切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 年 8 月。〈梵文 ḍ ṭ 的對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4 期，1948 年 6 月。
2. 〈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第 2 卷第 3 期，1948 年 7 月。
3. 〈玄應反切再論〉，《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5 期，1984 年 11 月。

周法高先生 1944 年的〈玄應反切考〉開啓了佛經語言研究的新契機。他在論文中發現《玄應音義》和《切韻》的音類，非常相近，假使我們認爲這種聲韻系統是人爲的，是『雜採古今方國之音』的，這可以有幾種可能的解釋。第一，音義成書，比《切韻》遲五十年，可能抄襲《切韻》的系統；第二，《音義》和《切韻》都採自較早的某韻書；第三，《音義》和《切韻》的作者各自定出一套人爲的聲韻系統而大致偶合。第三種假定可能性極微，因爲絕沒有這麼湊巧。第二種假定，可能性也不大，因爲根據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小注，隋唐以前的韻書和《切韻》都不相同。周法高先生認爲第一種假定，可能性較大，可是我們卻找不到任何根據。玄應書中從未提及陸法言《切韻》，《音義》中一字一音可以有幾條不同的反語，和《切韻》也大不相同。假使我們假定它們大體代表當時的實際語音，這種現象便容易解釋了。二書的作者有一個相同的，活的方言作藍本，而都經過一番嚴密的觀察，所以它們系統之相近便是意中事了。

周法高先生又討論了玄應書中的方言區域，在玄應書中提到一些方言中的差異，可以看出唐初方言區域劃分的情形。最基本而簡單的分法是南北的區分。《經典釋文》序所謂『方言差異，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切韻》序所謂『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南北是非』；都標舉南北的區分。

此外，周法高先生 1948 年發表《梵文 t d 的對音》一文，認爲梵音的「舌音」t, th, d, dh, 和國際音標舌尖後音 (supra-dentals) 的塞聲 (plosives) (t), (t'), (d), (d') 大致相當。在中國人的譯音裏，大致用舌上音知、徹、澄母的字來翻譯它們。但是在唐以前，有時候也用來母字翻譯。從表面上看，似乎翻譯梵文 t, d 的來母字是不規則的，是例外的；不過假使我們多搜集一些例子，便知道這不能算做例外了。早期的梵文譯音，除了用知、徹、澄母對譯梵文的 t, th, d, dh 外，還可以用來母字來對譯。其緣故在漢語裏沒有這一類的音，於是除了借用知系字外，有時還會借用來母字。周法高先生這篇論文主要解決了梵漢對音的問題。塞音 t 類和來母 l 都是舌尖音，二者的確十分近似，現代方言中就有許多是 t/l 共屬同一個音位的，例如閩南話。所以當時佛經翻譯，用來母字對譯 t 類音，是有可能的。

周法高 1989 年又指導了碩士論文《慧琳一切經音義聲類新考》（謝美齡 78 東海大學碩士論文），考訂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反切系統，按喉、牙、

舌、齒、唇的次序，把考訂所得的四十聲類依次討論，列出反切上字使用的次數、系聯的情形，若有同用或混淆的情形，則統計出例外的百分比，最後證明了周先生在〈玄應反切考〉中所主張的，認為慧琳反切所屬的音系是以當時首都長安爲主的「士大夫階級的讀書音」。

七、結論

周法高先生在聲韻學上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從閱讀他的相關著作當中，我們體會到了周先生具有下面三項特點，值得做爲我們治學效仿的榜樣。

第一，周先生治聲韻學不是只在聲韻的一個狹窄領域當中而已，他研究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把中國語音的歷史做了很好的貫穿，同時他也注意到聲韻學和其他語言學的相關學科是不能分割的，他探索了漢藏語言，探索了佛經語言，也探索了詞彙和語法，以這些知識做爲輔翼，更能夠提升了他在聲韻學上的境界，這是我們值得效仿的地方，因爲語言現象不是分割孤立的，就像一座山峰，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路徑登頂，各種路徑相輔相成，更加快了登頂的效率。唯有廣博的基礎，才能夠由博返約，做出更精緻的學術成果。

第二，周法高先生治聲韻學能夠不忽略上古漢的複聲母這個部分，這也是需要獨特的學術眼光和深厚的學術根基才能做到的，複聲母的研究使上古漢語的真相能夠更清楚，就像侏儸紀的公園一樣，復原了當時語言的真實面目。這對我們研究聲韻學的人來說，是很好的啓發，複聲母的研究，需要涉及許多相關的語言知識，例如，古代文獻、形聲結構、漢藏語言、語音演化、語言共性等等各方面的知識，雖然具備這些知識會有一些難度，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挑戰，不能畏難而止，停滯不前，只能在清儒的影子下打轉，這也是周法高先生給我們的重要啓發。

第三，周法高先生把聲韻學、語言學的知識應用到佛經語言的詮釋上，這又是一種開拓，使我們了解聲韻學不是象牙塔裡的知識，它有應用的層面，周法高先生研究了玄應大師、慧琳大師的反切資料，同時參考了梵文的對音，把佛經和聲韻學有效的結合起來，使人們對於佛經的問題有了新的切入點，加深了人們對佛經的認識，這不能說不是周法高先生過人的眼光，和具有前瞻的學術魄力所造成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的效仿。

參考書目

一、周法高聲韻學著作

上古音

1. 周法高：〈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3卷第2期抽印本，1970年。
2. 周法高：《周法高上古音韻表》，張日昇、林潔明編，周法高印行，臺北：三民書局經銷，1973年。
3. 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48年10月。
4. 周法高：〈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卷第1期，1972年12月。
5. 周法高：〈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5本，1954年6月。
6. 周法高：〈論上古音〉，《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

中古音

1. 周法高：《經典釋文反切考》，學士論文，1939年。
2. 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3. 周法高：〈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4. 周法高：〈說平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5. 周法高：〈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年7月。
6. 周法高：〈讀切韻研究〉，《大陸雜誌》，第69卷第2期，1984年8月。
7. 周法高：〈讀韻鏡研究〉，《大陸雜誌》，第69卷第3期，1984年9月。
8. 周法高：〈論切韻音（附英文摘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學報》，第 1 卷第 1 期，1968 年 9 月。

9. 周法高：〈On the Structure of the Rime Tables in the Yun-Ching 韻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4 本第 1 分冊，1983 年 3 月。
10. 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9 本（1948 年）。

佛經語言學

1. 周法高：〈說對音〉，《公論報史地副刊》第 32 期，1950 年 6 月 7 日。
2. 周法高：《玄應音研究》，碩士論文，1941 年。
3. 周法高：《玄應反切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 年 8 月。
4. 周法高：〈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1948 年 6 月。
5. 周法高：〈梵文 $d\dot{t}$ 的對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4 期，1948 年 6 月。
6. 周法高：〈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第 2 卷第 3 期，1948 年 7 月。
7. 周法高：〈佛教東傳對中國音韻學之影響〉，《中國佛教史論集》，1956 年 5 月。
8. 周法高：〈玄應反切再論〉，《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5 期，1984 年 11 月。

其他

1. 周法高：《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經銷，1984 年。
2. 周法高：《漢字古今音彙》，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3 年。
3. 周法高：〈讀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讀書通訊》第 53 期，1942 年 11 月。
4. 周法高：〈「中國語單音節性之再檢討」後記〉，《書和人》，第 465 期，1983 年 4 月 16 日。

5. 周法高：〈中國語單音節性之再檢討：駁金守拙及法蘭西斯「中國語爲多音節語說」〉，《書和人》，第 464 期，1983 年 4 月 2 日。
6. 周法高：《中國語文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63 年。
7. 周法高：《中國語文研究》，臺北：華岡出版部，1973 年。

二、研究周法高之著作

1. 陳雅婷：《周法高之上古音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09 碩士論文。
2. 劉心怡：〈周法高之中古韻母系統研究〉《有鳳初鳴年刊》第二期 2005 年 7 月 頁 109~124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生會，臺北。
3. 劉心怡：《周法高之中古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 2006 碩士論文。
4. 王天昌：〈周法高先生著作目錄〉，《書和人》第 11 期（1965 年）。
5. 余迺永：〈永懷恩師—周子範法高教授〉，《中國語文通訊》第 32 期（1994 年）。
6. 趙芳藝：〈語言學巨擘周法高教授〉，《國文天地》第 3 卷第 1 期（1987 年）。
7. 謝鶯興：〈周法高先生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4 期（2005 年）。
8. 嚴承鈞：〈周法高《上古音韻表》之部字匡謬〉，《音韻學研究》第二輯（1986 年）。
9. 張慧美：〈周法高先生音韻學研究之成果〉，《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
10. 張日昇：〈試論上古四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卷（1968 年）。
11. 李田意：〈悼念周子範老友〉，《中國語文通訊》第 32 期（1994 年）。
12. 余迺永：〈永懷恩師—周子範法高教授〉，《中國語文通訊》第 32 期（1994 年）。
13. 王天昌：〈周法高先生著作目錄〉，《書和人》第 11 期（1965 年）。
14. 竺家寧：〈向周法高教授請益問學〉，《國文天地》第 65 期，67-69，1990 年 10 月，臺北。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Phonology of Professor Chou Fa-Kao

Chu, Chia-Ning*

【Abstract】

Professor Chou Fa-Kao is a famous linguist in the world. His study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very extensive, and he proposed lots of opinions that enlightened academia. In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 and discuss Chou Fa-Kao's studies, especially on the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his influence to the posterity.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parts:

1. Professor Chou Fa-Kao's study on the archaic Chinese.
2. Professor Chou Fa-Kao's study on consonant clusters. It is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this area.
3. Professor Chou Fa-Kao's study on the middle Chinese. For a long period, one of the problems in middle Chinese is about whether that if the voiced consonants are aspirated. Chou Fa-Kao indicated that, "Regarding the question that if the voiced consonants are aspirated, it is insignificant in discrimination of their meanings." What Chou Fa-Kao pointed out gives enlightenment to academic circles.
4. Professor Chou Fa-Kao's study on *chongniu*: According to the *fanqie xilian* of Xuanying's "Yiqie Jing Yinyi", he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the distinction of *chongniu* in this document. Moreover, the distinction of two categories of *chongniu* words focuses on the main vowels in syllables. Furthermore, the other significant findings of Professo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ou Fa-Kao's study are that besides in the book "Guangyun", the distinction of *chongniu* in *fanqie* of the labial sounds existed also in books such as "Qieyun", "Jingdian Shiwen", "Xuanying Yinyi" and "Xuilin Yinyi".

5. In the last paragraph, we will introduce Professor Chou Fa-Kao's study on linguistic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texts.

Key words: Chou Fa-Kao, archaic Chinese, Qieyun phonology, consonant cluster